

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

——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

韩 鸿

内容提要 发展传播学已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进入多元范式阶段，参与式传播作为多元范式的主导理论，其基本理论、操作模式采取了与前两者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向，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乡村媒介建设、文化建设、信息生产方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与式传播是当今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发展传播多元范式的一种，参与式传播的基本原则、操作方法和走向一直是80年代以后发展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Servaes 1999; White 1999）。^[1]然而奇怪的是，在诸多中外合作的参与式发展项目在中国农、林、环保领域逐步推进的同时，有关参与式传播的研究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基本是空白 [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参与式传播理论的系统引介]。鉴于此，本文结合国际发展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参与式传播的缘起、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基本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参与式传播的中国价值进行评述。

发展传播学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参与式传播从一种基本的方法到今天较为系统的理论，有了30多年的历史。二战后，从众所周知的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到现在的多元范式，发展传播学在不断的修正和自我否定中，走到了今天以参与式传播为主体的多元发展阶段。

发展与传播之间始终存在不解之缘。上世纪50到60年代居于支配地位现代化范式，勒纳、施拉姆等学者认为对发达国家成功模式的移植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当然路径，大众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信息扩散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主要手段。其关注焦点是经济增长。其传播特色是一套精英主义的，垂直、自上而下、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Hom k把发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种：理论失败、项目失败和政治失败。^[2]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集中在理论失败上。Servaes（1991）认为建立在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范式在理论上有瑕疵：从方法学的观点来说，它扎根于进化论的传统，在价值观上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固守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偏见，漠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和路径。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源于拉美、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的依附范式走上前台。对依附的争论直接催生了70年代新信息秩序（new information order）运动。该范式着眼于摆脱对西方的依附，采取进口替代政策，保护民族工业，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传播和信息流动。但实践结果却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和政治上对发达国家的更大的依附（Servaes 1991）。

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拉美传播学者集体呼吁采用扎根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来回应当地的问题，由此设定了之后几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第三种范式认为各国之

间存在差别，没有普世的发展路径，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发展策略。以 Beltran 为代表的拉美学者在横向的、草根的、参与的、民主的和另类的传播上促进了参与式传播理论的发展。在其《告别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文中，Beltran 发展出一种基于近用、对话和参与的“横向传播”模式。他聚焦于近用、参与和对话问题上，呼吁关注草根、自力更生、解放、本土对话的重要性（Beltran, 1985, 1991）。其后更多学者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对于参与式传播理论的研究，从单向传送的传播模式向更为平等、民主和参与的观点转移。参与和可持续性成为多数发展项目强调的关键概念（Anyaegbunan et al., 1999）。^[3]

参与式发展理论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发展的新思维，采取了与经济导向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导向的依附理论不同的路径，它把发展视作一个整体、多维、辨证的过程，核心是强调发展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参与式发展传播认为，在发展决策过程中缺乏发展项目所针对的人民的介入，是许多发展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其理论前提为，倘若人们积极地介入到发现项目中，这些项目将会成为相关的、有效的和可持续的。^[4]

参与式发展传播被视作发展传播学和参与式研究的孩子。^[5]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模式是对第一阶段拉斯维尔模式或香农－韦弗模式为代表的传者导向的传统传播学范式的否定，也超越了第二阶段的依附理论范式，它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这种理论模式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标志着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同时用“交流”的概念取

代了“发送”的概念，这种理论不仅对人际传播注入了新的理解，同时对大众媒介的作用也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他们采用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方式关注发展中传播的作用，强调在社会网络中的小媒介运作以及草根传播手段的运用。强调当地社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国家、当地和个人各层面上的民主和参与的重要性。Jan Servaes 认为，在参与式传播中，专家和项目工作人员是做出回应而不是发号施令，重心是信息交换而不是扩散模式里面的劝服。^[6]因此参与式传播被定义为一个在人们、集体和机构之间的动态、互动和变化的对话过程，使得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全部潜力，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7]在参与式传播中，传播成为一种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开启对话以产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工具，最终目标是利用传播作为一种赋权工具，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8]

从以下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种发展范式和传播范式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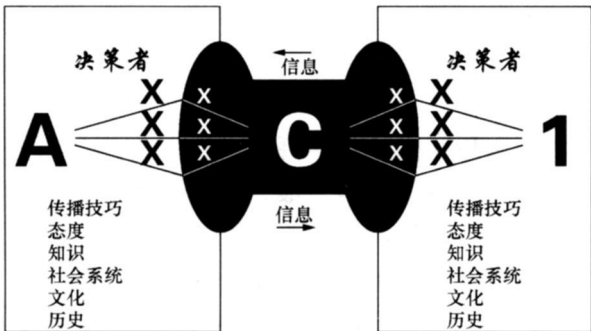
参与式传播的基本特征

Gumucio Dagion（2001）认为，参与式传播难以轻易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传播模式，而是包含了诸多不同的方法、学派和意识形态。^[9]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参与式传播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从诸多实践中仍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即参与式传播应基于过程导向、内生性驱动，同时反映当地价值和环境。这里的内生性驱动，指的是参与式传播所推动的发展并非建立在一个普遍模式基础上，而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传播也不是为了把信息传递

学 科	第 种范式 (1950 年代 - 1960 年代)	第二种范式 (1960 年代 - 1970 年代)	新范式 (1970 年代以后)
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	多元理论
发展政策	经济增长	再分配，基本需求和增长	可持续性发展
传播理论	线性模式	使用与满足理论，多级传播模式	参与式传播理论，理论融合
推广方式	扩散模式	社会营销及相关模式	参与式模式
社会变革的动力	经济增长将促进变革	自力更生将促进变革	对话传播将使人民组织起来导致变革

给特定观众而应该成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能够公开对话，通过知识和经验的交流来相互学习，在促进变革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参与式发展传播往往与发展计划相伴，把媒介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关注公众参与的过程，以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并通过实施一系列行动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实现发展目标。^[10]

1998年，Anyaeqbunam 等学者提出了参与式传播的工作模式：



在这个发展传播的工作模式中，传统的信源和信宿的设计已经被置换成决策者 A 和 1，A 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1 则是阿拉伯数字的第一个数字。这个模式舍弃了早期传播模式中的支配与控制。传播者 C (communicator) 被视作与在自己参考框架内的每个决策者互动的促进者。促进者解释两边决策者的意见和行动，以相互理解建立导致成功的联合决策 (Anyaeqbunam et al., 1998 9),^[11] 这里的促进者角色不是作为一个“媒体人”(media man)，传播被用来促进对话，建立互信，促进知识以及经验的传

递，旨在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只有当这些工作被完成之后，传播才可以指向更为传统的方式，比如确定相关手段，选择媒介，设计在特定地区所需要的意识增强、增加知识或者改变实践的信息。参与式传播建立在对话、互信、参与、分享等原则的基础上。这里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被认为是传播的内在的一部分，因此把传播带出了信息传送模式，其次是参与式方法要求内生性。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中并不提供预先设计的方案，而是在基本的原则指导下，基于田野研究来设计传播策略。

下表是参与式传播与其他的发展传播策略的一个简单对比。

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基础

韩国学者 Chin Saik Yoon 认为，在许多方面，传播的“技术”并没有改变，深刻改变的是技术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哲学。^[12] 参与式传播的理论之下，隐藏着深刻的理论转型。关于参与式传播的理论来源，我们有必要从 Johari之窗说起。学者 Chambers 有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只是在不同的领域”。Johari之窗就是这句话的形象阐释。窗口 1 (见下页表) 显示，外来者和当地人具有某种共享的东西 (例如共同的语言，对当地基本情况的了解)，这种共同的知识构成交流的起点。第二和第三个窗口指单个群体特有的知识，如窗口 2 代表外来专家的学术知识，国际经验等，窗口 3 表示当地人对于本地情况和问题具有外人不可比的深度知识和独特理解。因此，从共同的基础开始，

参与式传播	非参与式传播
参与者之间的横向传播，人民积极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工具的控制中	从传者到受者的垂直、自上而下的传播，人民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和行为的被指导者
对话和民主参与，通过意识唤醒加强能力建设	劝服、动员和短期行为变化
可持续的长期的变革过程	短期计划和快速见效的解决
集体赋权和决策	个人行为改变
社区参与共同设计和发布信息	外来者为社区设计
关注内容、语言和文化特殊性	对不同群体使用同样的技术、媒介和信息
人民的需要是关注的焦点	项目捐助者的需要是关注的焦点
媒介为社区所有	被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制约的媒介近用
意识增强	短期劝服

外来者和当地人必须携手合作，结合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最后一个方格的问题：即他们两者都不知道的问题。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区域往往代表着一个需要被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对话。

窗口 1: 公开的知识 他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知道的	窗口 2 我们隐藏的知识 他们不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
窗口 3 他们所隐藏的知识 他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不知道的	窗口 4 盲点 他们不知道的 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们不难发现，参与式传播的哲学基础既非一元主义也非相对主义，而是多元主义。多元主义认为现实是观察者的社会建构，现实通过个体之间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通过相互间持续不断的传播而被建构。在这里，真实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单一客观的可证实的真实，而存在着一个多样化的现实，所有现实在建构者的眼中都是同样有效的。因此这不是实证主义而是一种建构主义者的观点。

对话对于参与式传播的重要性正如媒介对于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一样。Käbfeisch认为，参与式传播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向理解的行动”^[13]。它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Robert B.Scott 1997）。^[14]这个假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同时代的保罗·弗莱雷（Paul Freire）和哈贝马斯（Habermas）。

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拉美国家对贫苦文盲进行的“觉悟启蒙运动”成为参与式传播的直接理论来源。他对囤积式教育（The Banking Education）的批判和对提问式教育的倡导，对发展传播学的当代转向有诸多启迪。弗莱雷认为，囤积式教育就像一种存款行为，教师是存款者，只要将某特定知识储存在学生的账户中，其教育过程便告结束。在这种囤积式教育里，知识成为一种礼物，由自认为“拥有知识之人”赠送给被判定为“缺乏知识之人”

（这种思想其实也是对现代化范式、创新扩散模式的一种批判）。这种囤积式教育模式使学生缺乏批判力、创造力和主动性，成为盲从的顺民。弗莱雷倡导以对话为媒介，使被压迫者对其被压迫状况加以省思，并经由实践行动自主性地改变自己的周遭环境。弗莱雷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强调对个体人格和“他者”的尊重）、马克思对于集体解决的思路的影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对于弗莱雷（1997）来说，真正的参与并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真正的参与是一个解放的经验，导致个人从“压迫结构”中获得自由并向能控制自己生活的主体转型。

弗莱雷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3）中提出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而要展开对话，民众的真正参与是先决条件。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可望获得“解放”。因此要塑造理想的言语场景，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自由发声和促成对话的媒介，将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向平行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转移。对于弗莱雷（1997）来说，词语既是反思也是行动，说出真实的词语就是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这也因此成为参与式传播的出发点之一。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产生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语言使用的目的是达致理解，而要达致理解，必须有质疑的自由、建议的自由，以及表达态度愿望和需要的自由。哈贝马斯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Habermas 1984）。这在传统的线性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体系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参与式传播作为一种参与者投身于以理解为目标的行为过程，成为理想言语情景的构建方式。交往行动理论的两个相关概念（理想言语场景和公共领域理论）因此成为参与式传播理论构建的出发点。

作为参与式传播理论基础的弗莱雷与哈贝马斯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都认为教师(或专家)必须抑制其知识的天生优越性,接受本土知识是同等有效和有意义的。他们都强调对话和传播对于建设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两者也有区别,对于弗莱雷来说,理想的教育是爱,鼓励倾听而不是家长式的指导式教学,因此被批评为太理想主义,而哈贝马斯更多强调传播场景的构建,而非言说者的个性。

参与式传播的基本模式

70年代以来,参与式传播理念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参与式传播被运用到人际传播和以媒体为中介的传播中。并发展出两种主要操作模式:

1. 乡村发展传播评估模式

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PRCA)最早起源于南部非洲地区的试验。该模式要求在乡村发展项目的设计、制订、实施、评估等各个阶段,传播都应成为征求村民意见和草根民众“发声”的手段。通过采用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视觉化技术、访谈以及集体讨论等手段,发挥民众的创造性,让边缘群体介入旨在促进社区发展的传播策略和项目设计中。增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和知识的共享。^[15]该模式旨在通过参与式传播来找准问题,分析问题,然后与当地人一起找寻解决办法,以保证传播项目扎根于社区现实。

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是在发展项目的设计之初采取的一种多学科和参与式的工作方法,以弗莱雷的对话理论为基础,Guy Bessette将它的方法学概括如下:

- 接近当地社区,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了解当地情况。
- 在制订发展研究计划时,让社区和利益相关者介入以拟订一个发展问题或发展目标,发现该计划的多个维度、面对问题时的解决办法和达到目标的前提条件。
- 决定当地社区希望实施的套行动,立足当地情况考虑实施的必要条件。
- 形成一个发展项目策划,准备和实施一个传播计划来支持一系列被利益相关者认可的行动。
- 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必要知识的获得来实施行动,规划结果的分享和利用。^[16]

在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中,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视觉化技术包括计算机动画、图表、录像和照片(这些视觉技术并不要求文字识读力,通常由当地人自己制作),研究者和社区在一起通过采用社区绘图、焦点小组讨论、问题树分析等,促进乡村社区的讨论和对话,提高人民对他们目前环境、问题和资源的理解和传播,来保证项目的相关性以及项目受益人的权属感。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是一个过程,是研究者和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办法及其社会经济和自然特征达成一个相互接受的阐释和理解的过程。由于参与式传播的有效性,它逐渐成为联合国主要机构、非政府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主要传播方法。9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的项目中,参与式传播已经成为发展传播的主导范式。

2. 乡村信息传播模式

参与式乡村信息传播模式关注公众和社区对适宜媒介的近用问题,与英国经济学家E. F. Schumacher的著作《小就是好》的观点一致,参与式传播采取了与现代化范式不同的媒介观,强调“适宜技术”的重要性。大规模的全国性传播行动被放在一边,更重视各种乡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Jan Servaes将其核心思想总结为“自我管理,即村民在媒介内容的规划和制作中的参与”。^[17]参与式乡村信息传播模式通过构建一个传播平台,让这些边缘化群体加强内部的交流,意见的表达,以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平台的构建过程中,社区广播、电视、街头戏剧、民间媒介、参与式录像、社区信息中心、网络等构成了信息传播系统的一部分。

2001年,Gumucio Dagron曾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对50个采用广播、戏剧、录像等媒介的参与式传播项目进行了总体回顾。在诸多传播工具中,由于广播成本低、易操作,更适合具有丰富口头文化的乡村。在今天的印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乡村地区,由乡村自我管理,由村民参与制作,针对本土诉求的参与式广播已经成为最基础和影响最大的媒介。尤其是印尼的Local Radio Network 墨西

哥的 Radio Huayacocotla、菲律宾的 Community Audio Towers、中南美洲的人民记者运动 (the people's reporters movement) 等成为乡村广播发展的典型模式。

参与式录像也是目前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重要媒介，古巴的乡村电视机构 TV Serrana 和印度的“社区录像小组”为其代表。TV Serrana 覆盖古巴边远的 Maestra 山区的 32000 名村民，制作针对乡村的农业、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儿童权利等问题的录像，用骡子运送影像器材、发电机到边远的山地乡村社区巡回放映。当放映结束后，随即针对片中反映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村民的意见被拍摄成录像信函 (video letter)，呈送政府有关部门，从而促进乡村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和草根声音的畅达。在印度，普通的“社区录像小组”由 5 到 10 名受过录像制作培训的当地村民构成。每个小组覆盖半径大约为 50 公里，每月制作一部长度为 30 分钟的录像杂志，在 20 多个村庄或贫民区用投影机露天放映，总到达率约 1 万人。每期节目内容由当地社区成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决定。观看录像之后，社区制片人发起关于有关录像主题的讨论，并倡导社区民众采取相应行动。到 2010 年，社区录像小组将达到 50 个，培训的社区制片人达到 350 名。^[18] Denise Gray-Felder 的实证研究显示上述以社区为基地的乡土传播模式是达到被边缘化弱势群体的最好和最有用的方式。

参与式传播的理论争议与反思

目前对于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仍然有诸多争议。首先就是对于参与的定义。什么是参与？参与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参与是手段还是目的？上述疑问一直困扰着参与式传播的理论研究者和操作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目前“参与”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或操作。在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中，Uphoff 根据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确定了四种不同的参与方式 (Uphoff 1985)，Pretty 则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列出 7 种不同类型的参与方式，以致 Shirley A. White 认为，“参与”这个词是一个万花筒，在不同的人手中根据其意愿不断改变着颜色和形状。^[19] 对一些人来说，当地人的参与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对另一些人来说，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即项目实施中达成一

套期望的过程和关系，而不该成为一种手段。

本质上讲，“参与”实质上是一个调动社区成员共同介入的过程，这种介入涉及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规划、设计、实施、回馈等各个环节。在乡村信息传播模式中，“参与”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集体参与，在内容选择上由社区民众决定，在观众定位上针对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决策者，在传播方式上采取针对性的小众传播，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回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因此社区影像的“参与”体现在参与者来自社会各层面，渗透到信息制作的各个阶段，因此参与既是目的也是手段。1977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报告中，对“参与”曾经进行了定义：参与意味着在较高层面上对传播系统的公众介入，包括公众在制作过程以及传播系统的管理和计划中的介入。自我管理则是参与的最高级形式，此时，公众在传媒中行使决策权，并完全介入传播政策和计划的执行中。^[20]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对“参与”的最好表述。

参与式传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赋权。赋权通常体现在个人、人际、社区三个层面：个人维度涉及到个人自尊和自信的增长；在人际层面上体现为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获得批判思考的能力；在社区层面，赋权意味着在社区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角色 (Parsons et al., 1988)。这三个层面应该说是一个递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难度递增的过程。与对无权者的“赋权”相对应，赋权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去权” (disempowered) 的过程。但是，正如权力很难获得的一样，对权力的放弃也很难。Hillyard 认为，大多数参与式项目建立在一个可疑的假设上，即简单地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聚到一起就可以导致对各方公平的共识的产生，这只能建立在所有参与者具有同等权力或不平等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的前提下，然而这几乎不可能。协商本身并不足以授予边缘群体讨价还价的权力 (Hillyard et al 1998: 34-35)。^[21] 可以说，参与式传播所强调的赋权有很大的理想成分，传播的民主化必须与政治的民主化相对应。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式传播的实践仍然受到种种权力因素的制约和困扰。参与式传播自身的推进往往借助推动者的权力，如果在项目

实施中对当权者奢谈“去权”问题,难免有与虎谋皮之感。因此目前的赋权更多体现在个体的能力增强上(capacity building),在缺乏更大的民主空间和制度平台的前提下,社会层面的“赋权”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虽然参与式传播的优点有目共睹,但严格说来,发展传播学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严格范式转换。主导范式也并没有完全被参与式传播所替代,范式之间往往体现为一种交叉融合关系。即便今天,许多发展项目仍然运用现代化范式(例如对因特网的普遍应用)、依附范式(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抵抗)或者这些范式的结合(社区参与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亲社会信息的扩散)。

参与式传播理论对中国乡村传播的启示

1. 内生性媒介的建立:乡村传播的发展思路

总体来看,近年国内有关乡村信息传播的模式探索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和范式制约,基本囿于现代化范式,即麦奎尔(Mcquail, 1993)所指的“从外部或上级的变革力量之角度而设计的外部或操纵式的模式”,集中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流动,而较少考虑如何加强农村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农村内部的水平传播和互动传播。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从“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到“信息入户”工程,我国开展了多项针对落后地区农村的信息系统建设,收效显著,但由于缺乏扎根乡土的内生性媒介系统,一直面临着可持续性问题(缺乏扎根乡土的内生性媒介系统,长期靠外来输血维持)、“最后一公里”问题(已有的信息服务入户率低,实效差)、乡村媒介建设的脱节问题(信息内容与信息需求的脱节,媒介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脱节)、乡村信息安全问题(应急能力弱,突发事件中易因传播不畅导致次生灾害)。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角度切入,提出解决问题的乡村传播模式构想,如“贫困山村发展传播模式”(仇学英, 2004),“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刘玉花, 2004),“多样信息传播模式”(谭英, 2004)等。但这些外来推动模式的缺点是明显的,因为西方发展传播学者

在对诸多重大发展项目的成败得失总结中发现:“(项目)规模常常与推动者的政治议程和内部行政管理而不是与发展的需要相关,在短期内‘成功’的要求(即‘年度报告综合症’),或者对项目受益人数量的度量(越高越好),常常导致这些发展项目仅仅在资金提供的情况下是‘卓有成效’的,而忽视了质性的方面和长期效果,一旦技术援助和资金撤离,这些项目并没有给草根民众留下什么东西”。^[22]这是值得警惕的教训。在乡村信息系统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短期行为”构建“长效机制”,使诸多针对“三农”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资金推动的工程变为内生性的自我维持的内在传播系统,需要我们思考和寻找新的办法。

目前以广播电视下乡为主要标志的“村村通”工程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项目后期遇到的困难加大,全国有71.6万个20户以上的行政村仍然是广播电视的“盲村”,有5千万农牧民看不到电视,与此同时大量的已通村落还在“返盲”。^[23]另一方面,乡村传播的媒介结构和单向信息传播对于乡村治理产生了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导致了“饭市”、“议话坪”、“火塘”等乡村公共空间的失落(韩鸿, 2009; 陈新民, 2009; 吴非, 2006)以及干群交流的困境(张世勇, 2008),并逐渐造成村庄共同体的解体(贺雪峰, 2001)。

2008年笔者在四川茂县的两次灾后调查也发现,农民的信息结构呈现畸形状态。当地的媒介环境极为单一,卫星电视是主要媒体(入户率近90%),羌民对万里之遥的国家、全球大事了如指掌,但是对所在州、县及邻近乡村情况却一片茫然,信息的接近性和关切度与易得性呈明显负相关。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对可靠的本土大众信息传播渠道与乡、村、组的三级基层组织传播进行配合和印证,导致对抗性的流言较多,怀疑和猜忌蔓延,对组织传播的效果进行剥蚀和抵消,加剧了某些村民的相对剥夺感,影响了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和灾区的社会稳定。而另一方面,震后大众媒体的信息沟通功能和救助功能未能使乡村受益,缺乏本土化、有针对性的农牧业生产技术指导和有用信息,制约了当地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本土信息传播系统的缺失成为灾后重建中一个亟待

引起重视的问题。

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参与，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社会经济参与，贫困农户和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参与式传播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乡村传播的总体思路上有必要进行调整，从大众媒体的信息前端和终端来找到解决乡村传播问题的突破口。在乡村传播理念上，有必要把重心从告之、劝服转向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流，通过共同讨论、参与、行动来解决问题；在乡村媒介的发展思路，应摒弃现代化范式的大媒介观，重视各种乡土媒介和“适宜技术”的重要性。2008年8月，笔者曾对四川古蔺县桂香村村民自建的“夫妻广播”进行调查。发现在没有国家资金扶持和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这个农民自己创建的具有参与式传播特征的乡村广播已经开办了14年，在树立村“两委”公信、公共事务参与、移风易俗、公共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该村农民人均收入增加8倍的重要“助推器”。^[24]农村的这种草根传播和乡村内部的横向教育、对话与沟通，有助于抵消乡村日渐加剧的疏离感，提高“社会关联度”，构建乡土“熟人社会”，加强乡村的道德引导和社会关怀，促进乡村有用信息流通，构建社区认同，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较好的媒介基础。

阿芒·马特拉指出，从大型媒介转向微型媒介，“指望自己的力量”，动员地方资源以便满足地方需要，这就是新的发展哲学提出的方向性轴线。^[25]因此鼓励民间媒介创新，倡导社区广播、戏剧、舞蹈、绘画、流动电影、民歌等媒介的使用，通过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高技术与低技术媒体的结合，进行以乡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望突破大众媒体内容与农民生活的疏离，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对于完善农村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有较大裨益。

2. 村民共建：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参与式传播的本质就是强调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独特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地方传统文化并非被视作应被征服的障碍而被抛弃（如现代化范式），相反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中介和发展的助推器。因为这些传统文化本身即是

一种媒介，即文化和媒介本身是同一的。这些民间媒介——民间故事（评书）、民间戏剧、木偶剧、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叙事诗、谐剧和其他互动形式的宗教或世俗传播形式——构成了一个镶嵌在文化中的传播系统，这些传统媒介构成了乡村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媒介和信息资源。因此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建设，某种程度上就是地方媒介的建设和保护，两者是二而一的。这对我国乡村文化的价值认知和发展思路均有较大启迪。

学者贺雪峰把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认为“采取何种办法及通过什么方式，来广泛开展适应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文化活动，让农民从文化活动中获取意义，得到帮助及感到满足”，是今天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任务。但是“采取何种办法及通过什么方式”，尚有待探索，而参与式传播却可以就此进行有价值的回应。

当前农村，市场经济及外来价值观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日益边缘化。在传统已失，现代又不可得的尴尬境地中，农民原先以集体为中心的精神家园涣离，农民鄙视自我身份，厌恶农村生活，茫然、失落，甚至绝望的情绪蔓延。这一问题的恶性循环，势必加剧乡村社会的分裂和原子化。戴维·莫利认为，面对激变的经济和社会，寻求社会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冲动反而会愈益强烈。其中的一种反应是到较为局部性的地域意识和认同意识中寻求慰藉。^[26]以农民为主体，以乡土为依托，以参与为特征的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可望为这种乡土纽带的维系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找到支撑点。

近年来，中国农村自发兴起具有参与式特征的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点。在贵州省榕江县栽麻乡，侗寨村民石文昌组织村民排练侗戏《珠郎娘美》并到周边村寨表演，复兴侗族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西双版纳勐宋村哈尼族青年妹兰，采用参与式的绘图方法，寻找流散在老人记忆中的传统知识，绘制哈尼族的传统节日和农事历，传承轮歇农业耕作文化，并在本乡和周边地区巡回展示。云南阿子营乡龙嘴石村村民张孝春，用苗汉双语创办《山村小报》，走访村里老人，记录民族故事，搭建大花苗民追思历史、分享传统知识的平台。山东孟金寺村农民自编自拍电视剧

《刘氏春秋》追溯600年村落历史和宗族血源。都是一种以参与为特征的形成和强化群体意识或阶层意识的自发行为。在一个个民间小叙事中,舞蹈、歌曲、摄影、绘画、录像等传统和现代媒介成为整合社会共同体的手段和社会连接的纽带,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群体需要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资本,增强文化自信。村戏、舞蹈、电视剧的拍摄和观看成了集体的仪式和公众狂欢。在热闹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在认祖归宗的文化遗产中,通过自娱自乐的乡村文化活动,广大村民重新走出家门,由陌生到熟悉,由疏远到亲近,从而逐渐恢复和建立守望相助、自然和谐的邻里关系,找寻到一种新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与送戏、送书、送演出、送电影、送科技等“送文化下乡”的“喂食”式的帮助有根本区别,它是以“种”文化为特征的内生性文化的生产。这种对乡村生活的满足感,乡村社区的归宿感,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一方面在参与式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建立,另一方面也在参与式文化传播中得到放大、播撒和强化。这些乡土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可以形塑村民的地位和自我认同,重建村庄生活的意义,可以成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导方式。

3. 村民参与:乡村传播的内容生产方式

Simone Cecchinia在印度的实证研究发现,即便信息基础设施到达乡村地区,也并不能保证村民对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而信息需求和内容供给之间的错位还会导致村民对信息内容的不关心和对媒介的冷感。^[27]因此,对以“村村通”为代表的乡村大众传播体系建设中内容生产的不足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在我们2008年进行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问卷调查中,选择“想知道”或“非常想知道”邻近乡村消息的村民占74%。显示出农民对于本土消息存在较旺盛需求。我们乡村传播的建设不能仅仅建立在以“大喇叭”为特征的传声筒之上,而应在内容生产上的自组织、内生性、本土性上做文章,在内容上加强针对性、贴近性和时效性,在内容生产方式上加强参与性、本土化和互动性,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通”。

乡村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信息生产方式、信息内容构成、传播者队伍培养与城市有较大差异。在以“半熟人社会”为特征的村民自治

的乡村环境中,建立与之适应的传播基础设施和传播者队伍,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发展传播学者Alfonso Gumucio Dagron发现,大多数从事发展传播的工作者并非来自专业传播者队伍和大学教育,而是农艺学家,社会学者,乡村工人,他们比起职业记者来讲是更好的发展传播者。^[28]国外诸多参与式传播实践也证明,业余的信息传播者是乡村参与式传播系统中的主体力量。例如中南美洲的人民记者运动(the people's reporters movement),“人民记者”全部由免费接受电台培训和技术协助的乡村志愿者组成,他们制作和发送关注当地问题的节目,进行乡村报道。在RadioYan Vnagr等乡村广播中,村民能够通过广播直接表达他们的观点,针对自然资源管理的问题,寻找问题的原因、结果和潜在解决办法。因此在国内乡村信息传播的内容生产方式上,建设一支扎根乡土本土、自我服务的乡村传播队伍是保证长期通,不返盲的核心力量,也是其内容丰富性、乡土特色和有用性的可靠保证。在县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在硬件建设之外,建设包括乡村技术能人、文化能人、致富带头人、打工返乡者为主体的扎根乡土的基层传播者队伍,应该成为着力考虑的重点。

在中国农村曾经存在着多种乡土传播和民间公共领域,民间的村戏、社戏、花灯,以及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广播也曾经在乡村集体生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遗憾的是上述传统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荡涤殆尽。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能否借助参与式传播理论,重建乡村的信息秩序和舆论空间,发展基层民主,激发自力更生精神,构建适合农村发展的和谐文化和媒介环境,有待从实践中进一步找到答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课题“参与式影像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研究”的阶段成果,编号08JC860001。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注释

- [1] Kabfleisch, Pamela J.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Mahwah, NJ and London: Lawrence

-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P. 92
- [2] Homik, R. C. (1998).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griculture and Nutrition in the Third Worl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 32
- [3] Anyaegbunam, C. Mefabulos P. and Moetsabi T. (1999). Facilitating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New Training Models and Techniques. In S. A. White (Ed.), *The Art of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PP. 207–228). New Delhi India SAGE Publications
- [4] ketan chitnis the duality of development recasting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using structuration theory investigaci n y desarrollo vol 13 no 2 (2005).
- [5] Guy Bessette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A Guide to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DRC, 2004 P. 12
- [6] Jan Servaes Thomas L. Jacobson, Shirley A. Whit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1996 P. 16
- [7] Singhal A. (2001), Facilit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New York UNICEF. P. 13
- [8] Mefabulos Pa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e case of the FAO Project 2003 P. 91
- [9] Alfonso Gumucio-Dagron *Making Wave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01, P. 8
- [10] Guy Bessette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A Guide to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DRC, 2004 P. 9
- [11] Anyaegbunam, C. Mefabulos P. and Moetsabi T. (1998) *Participatory Rural Communication Appraisal Starting with the people*. Harare, Zimbabwe FAO/SADC
- [12] Chin Sak Yo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West African Agenda <http://www.southbound.com.my/communication/partcom.htm>.
- [13] Koblisch Pamela J.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Mahwah NJ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P. 107.
- [14] Robert B. Scott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The Saint John Project <http://www.idsnet.org/Papers/Democracy/>
- BOB_SCOTT.HTM.
- [15] Paulin G. Djit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8 P. 18
- [16] Guy Bessette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A Guide to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DRC, 2004 PP. 11–12
- [17] Jan Servaes Harnessing the UN System Into a Common Approach On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7; 69: 483
- [18] Alfonso Gumucio Dagron *Making Waves Stori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ublish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2001. PP. 143–146
- [19] Shirley A. White “The concept of participation transforming rhetoric to reality.” i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working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20] Jan Servaes Thomas L. Jacobson Shirley A. Whit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1996 P. 18
- [21] Hildyard Nicholas et al (1998). ‘Pluralism, participation and power’ *Forests Trees and People Newsletter*. No. 35, March 1998 PP. 31–35
- [22] Hildyard Nicholas et al (1998). ‘Pluralism, participation and power’ *Forests Trees and People Newsletter*. No. 35, March 1998 PP. 31–35
- [23]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7年，61页。
- [24] 韩鸿：《参与式传播对乡村广播发展的启示：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的调查》，《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
- [25] 阿芒·马特拉，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75页。
- [26]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6页。
- [27] Simone Cecchinia and Christopher Scott C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Lessons from Rura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Vol 10 PP. 73–84, 2003
- [28] Alfonso Gumucio Dagron Translated from: *La Formaci n de los Comunicadores para el Desarrollo* by Manuel Calveb. 2001, PP. 9–11.

24 *A Successful Opinion Making in Moder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Incident of Qiu Jin*

He Yangming

Qiu Jin is a famous woman journalist and a revolutionar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n July, 1907, being accused of plotting a rebellion, she was arrested and beheaded few days later in Shaoxin, Zhejiang.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Qing Government was attacked by the Chinese press for several years.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cident of Qiu Jin has achieved significanc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wide and continuous coverage and comments on the incident forced Qing Government to punish some officials concerned and made some reformations; second, press opini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was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rd, it was the landmark of opinion mak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34 *Cultural Emancipative Values of Network Media: A Study Based on Media-biased Research*

Fan Mingxian

This paper concerns abou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new media.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cultural emancipative values of internet media and how the values become possible in media-biased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re are two aspects about media bias: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cultural. Social-cultural bias is the impact trends of technical bias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 The inclusive nature of the network media-bias may b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tolerance of individuals in communication. Because the inclusive nature of new media extends its influences into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system is under attack, and the cultural emancipative values of internet media are able to be achieved.

40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Paradigm Shift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its Chinese Values*

Han Ho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has evolved from modern paradigm, dependence paradigm to multiple paradigms. As the leading theory,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have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way, and whos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rural media construction, culture building and the way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n China.